

邢贲思 主编

大洋的彼岸——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现状

- 高贵的白色
- 人性的扭曲
- 文化危机的无尽历程
- 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变化
- 新的狂飙突进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101号

16

大洋的彼岸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现状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3017733-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经济科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印张10.19 字数200千字

1992年10月 第1版 1992年10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091-330-9/D·111

定 价：5.60元

6065/13

总序

邢贲思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以来，我国人民已在改革开放这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上走过了十多年的历程，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时至今日，当中国的经济再次面临新的腾飞的关键时刻，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又发表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讲话，及时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目前，全国人民都在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正满怀信心地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去。

面对当前的新形势，光明日报出版社组织编写了“政治思想导向丛书”。丛书的编著者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认真研究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理论联系实际，努力回答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例如，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包括哪些基本内容？如何理解近现代中国百年史所给予我们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有哪些启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的挑战，以及如何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发展？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的现状如何，有什么可借鉴之处，又存在哪些矛盾？中国改革开放走过十年路程后的今天，面临哪些挑战，其前景如何？等等。

我们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

个不发达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全新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党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化、模式化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教条化、抽象化的认识，我们党犯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很大弯路，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才重新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四十年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不断探索，终于使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所在，我们必须用它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历史的经验教训也证明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我们只有坚持这条基本路线，才能顶住风浪，巩固我们的成果，并进一步发展自己，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这里，相关的另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对此，邓小平同志在其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思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没有改变，因而依然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亦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环节，改革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就是邓小平

同志所说的改革。毫无疑问，正是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提高，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使社会主义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不能像小脚女人那样迈不开步子，看准了的要大胆试验，大胆地闯。关于姓“资”姓“社”的问题，其判断标准应遵循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判断标准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並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首先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种种禁区。在目前形势下，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同志对我党70年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值得我们深思。左的东西貌似革命，实质上会断送革命。“宁左勿右”和“左比右好”的思想倾向，在我们党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有过惨痛的教训。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关键在于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依靠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在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广泛调动国内广大科技教育战线上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他们在改革的浪潮中大显身手。并且，我们还要大胆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把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借鉴过来，为我所用。

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新的问题、新的困惑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新的狂飙突进：繁荣时代的来临..... | (1) |
| 第二章 | 朝阳中的夕阳：繁荣背后的困扰..... | (41) |
| 第三章 | 没有掌声的落幕：高速发展的终结..... | (113) |
| 第四章 | 不自由的结构：阶级构成与阶级关系..... | (128) |
| 第五章 | 政治统治的细节：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 | (147) |
| 第六章 | 制衡中的专横：国家职能与行政权力..... | (168) |
| 第七章 | 限压阀与压舱铁：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变化 | (183) |
| 第八章 | 非理性主义的倾斜：现代主义..... | (198) |
| 第九章 | 文化进程的复杂性：界限的消失..... | (217) |
| 第十章 | 文化危机的无尽历程：后现代艺术..... | (232) |
| 第十一章 | 分裂与组合：家庭的透视..... | (252) |
| 第十二章 | 人性的扭曲：犯罪面面观..... | (274) |
| 第十三章 | 高贵的白色：种族的歧视..... | (299) |

第一章 新的狂飙突进： 繁荣时代的来临

一、历史的回顾：战后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火，在德意日法西斯的全面崩溃中渐渐地熄灭了。以美苏英等国为首的盟国取得了空前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也使世界格局从凡尔赛体制过渡到雅尔塔体制，从而使世界进入到美苏两大集团的冷战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战后初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着战后经济重建的繁重任务。西欧和日本——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因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生产停业，物资匮乏，工人失业，物价暴涨，经济一片凋敝。1946年，德、日两国的工业生产仅及战前1937年的30%，直到五十年代初才恢复到战前水平。英国虽是战胜国，但也在战争期间国民财富损失四分之一，1945年工业生产比战前减少20%，1947年才恢复到战前水平。法国受到的破坏比英国还要严重，到战争结束时，工业产量占有战前的40%，直到1948年才恢复到战前1937年的水平。只有美国发了战争财，工业生产能力在战争期间增加了40%，但它经历了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转变的阵痛。1946

年比1943年工业生产下降了29%，1948年恢复到接近1943年的高峰水平。

经过战后几年的恢复重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50年代初开始进入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从1950年到1970年，日本工业生产增加15.07倍；西德增加3.25倍；意大利增加3.62倍；法国增加2.13倍；美国增加1.24倍；英国增加0.76倍。在这二十年中，日本工业生产增长率一直保持领先地位，每年递增14.1%，其它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依次为：意大利8%，西德7.5%，法国5.9%，美国4.1%，英国为3%。

纵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人们不禁要问：无论是德、意、日这三个战败国，还是英、法、美等这些战胜国，在二战中遭受如此巨大的破坏（美国除外），在这不长的十年、二十年间，不仅取得了经济恢复重建的胜利，而且还取得如此辉煌的经济成就，它们有什么灵丹妙药，还是有什么神奇的法宝？答案并不复杂。

首先，科技革命高潮的到来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第一个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让我们花费较多一点的笔墨来回首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

在本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控制论、电子学、微电子学的创立以及原子能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人类开始掌握利用核能的技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并逐步推广，人的逻辑思维职能开始逐步转移到使用电脑来代替，核能和电子计算机成为战后科学技术革命的象征。五十年代末人类又开始向宇宙空间进军。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数学家香农在《贝尔系统技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论文，不仅最早提出了信息论的概念，而且也提出量度信息量的数学方法。到60年代以至后来

一段时间，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是：①生产过程、管理系统的高度自动化，可以克服高温、低温、高压、有毒物质、潮湿等因素对生产的限制影响；②发现并使用新能源；③研制并采用新型结构材料，新材料可以根据需要具有耐高温、高压、抗低温、耐腐蚀等特征，可具有可塑性、记忆性；④采用激光、电化学、超声波、高频等最新工艺加工手段，代替传统的机械加工方法。在这一时期，科学正在直接转变为生产力，实现科学研究，生产的一体化，社会劳动分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整个生产过程的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向着低消耗、高效率、高收益的方向发展，劳动过程也转变为科学的生产过程，从而提供了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的三大差别的物质技术前提。7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是以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光导纤维、激光、海洋开发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其中微电子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也被称作信息技术，是新技术革命的基础和先导，也是新技术革命的核心内容。1971年美国研制出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微处理机，迅速推动了电子计算机生产和应用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空前普及，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电子和机械技术的结合，推动了传统工业“重新工业化”的热潮。在生物技术方面，1973年第一次实现了对基因（遗传物质）的剪接和重组，使其获得特定的遗传性状，这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一个质的飞跃。意大利的科学家们称之为生物工艺学的革命。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社会的更高认识。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预测尝试》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并指出了后工业社会具有的五大特征：1. 社会经济由制造业为

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2. 社会的领导阶层由企业主转变为科学的研究人员；3. 理论知识成为社会的核心，是社会革新和决策的依据；4. 未来技术的发展是有计划、有节制的，技术评价的地位十分重要；5. 依靠“智能技术”制订各项政策。虽然他的这些观点后来并未完全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但他对当时社会的飞跃发展的现实以及科学技术对当时社会的深刻影响却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因为理论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已成为革新和变革的直接力量。科技革命创造了极高的经济效益，开辟了广阔的投资领域，诱发了新的消费需求，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战后五、六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了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用巨大的财政力量和各项政策措施促进新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刺激投资和消费，抑制经济衰退，争夺国外市场，因而对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二战后的三十年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是凯恩斯主义，各国政府也都采纳了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这是因为“战争和经济的破坏逼迫各国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第150页）。“国有化”是这一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突出表现。如英国经过40年代和70年代两次国有化高潮，政府先后将煤、钢、电力、煤气、铁路、航空、造船及飞机制造部门的所谓“主导性大企业”收归国有，转而又向“英国国民石油公司”投资51%，并成立了“国民企业局”，负责对私营制造业中由于管理不善行将破产的企业进行国家投资。在意大利，战后也曾对电力、铁路运输、航空等部门实行“国有化”。据统计，当时意大利国家所有制在全国经济

中占工人总人数的14%，占工资支出的26%，占国民总产值的20%，占投资总额的一半左右。根据70年代的资料，原西德的国家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3左右，在基础经济部门几乎处于绝对控制的地位。美国的国家所有制，整体来说不如西欧国家那样发展如此迅速，但在二战期间，美国政府也一度用财政拨款兴建了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军工部门，其中政府投资超过了90%以上，这也是美国军事实力能够称霸世界的原因之一。日本在战后也兴建了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铁道、公共汽车、航空、邮政、电话、电信、广播、电力、煤气、自来水等部门。这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及制定经济计划来对整个经济进行宏观调节，而且通过国有化运动，直接经营企业，参与经济活动，使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尤其在基础工业部门中，许多国家的国有企业竟达50%—100%。因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其实质上就是国家资本与私人垄断资本的结合，在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起到了促进作用。

战后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是五、六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第三大要素。战后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稳定了当时动荡不定的国际金融市场，为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某些发达国家的发展还受到特定因素的影响，如原西德和日本，曾经得到美国的大力扶植。美国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向它们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经济上的空前破坏，唯独美国却利用战争大发横财，取得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绝

对优势，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当时美国打着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旗号，积极向外扩张，妄图扑灭社会主义和民族革命的烈火，并力图把西欧、日本等国控制在自己的指挥棒下。于是它利用美元作为对外进行经济渗透的手段，通过签订双边和多边协定，开始对外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1945年12月美国对英国的政府贷款是美国最早的一笔经济援助。当时英国经济极度困难，发生了严重的“美元荒”，急需美国的贷款和物资支持，以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美英两国政府签订了财政协定，规定美国向英国政府提供37.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其条件是英国要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和支持美国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美国又于1947年签订了一笔战后最大的国际性经济援助协定，即马歇尔计划，也叫欧洲复兴计划。根据该计划，从1948年底到1951年底，美国共向西欧国家提供了17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后来美国又根据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1949年）等一系列的法律，对外进行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据统计，1944—1955年，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总额为408.66亿美元，援助对象国主要是英、法、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欧洲复兴计划为战后欧洲经济的复兴，尤其是原西德的重新崛起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战后的日本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向日本和其他国家大批定货；同时美国的核保护伞免去了德、日的巨额军费开支，无需德日自己出钱来维持国家的安全与防务，这些都对德日两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如此的辉煌和值得炫耀，这也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困扰形成鲜明的对照。以我们中国为例，六、七十年代的中国

正是十年内乱时期。“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在如此残酷的政治旋涡中，中国人民经历了不堪回首的痛苦和尴尬：人民公社、大跃进、一大二公等“左”倾做法在经济上把中国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同样在原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与中国类似的情形，失去了大力发展科技、发展经济的大好机会。就这样，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当我们从恶梦中醒来的时候，才发现“那边的世界”已经今非昔比了，我们远远地落后了。多么惨痛与残酷的教训啊！历史再一次告诉我们，经济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二、八十年代的调整

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迅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却陷入了经济滞胀状态。这种滞胀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在滞胀时期，各国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现象严重，通货膨胀率大幅度上升，出现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交织并发的局面。如60年代与70年代的经济增长相比，美国由4.0%降至3.1%，英国由2.8%降至1.8%，法国由5.5%降至3.7%，西德由4.7%降至2.8%，意大利由4.4%降至3.1%，日本由11.3%降为4.8%。从60年代到7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美国从2.8%上升到7.8%，英国从4.0上升到13.7%，法国从4.0%升至9.6%，原西德从2.6%上升到5.1%，意大利从4.9%上升到13.9%，日本从5.8%升到9.0%。

从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处于深刻变化的过程中，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也都在发生着全面而明显的变化。为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各国都在经历着一

个重新适应、选择和改革的时期。世界发展的主要潮流开始转向缓和与经济发展。过去主要依靠军事实力、军备竞赛、政治和军事对抗手段为主来处理国际关系，现在正在向和平共处、经济实力、竞争与合作转变，并逐渐形成各国国民经济优化和经济竞争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经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从而使其经济进入调整时期。1980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改变英国政府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推行货币主义的经济改革，先后采取紧缩信贷、控制货币供应量、降低税收、削减公共开支，减少国家干预，放松金融控制等措施，力求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与低速的增长。1981年，里根总统执政后，开始一场“里根革命”，实行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主张，实行一整套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供应学派的宽松的财政政策，旨在减税促进投资和储蓄，生产增长后增加税收，使财政收支得以重新平衡。货币主义的紧缩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以高利率吸引国外资金，一方面弥补财政赤字，另一方面又不至因高财政赤字而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大幅度提高利率，意在压缩货币供应量，抑制通货膨胀；扩大政府开支，意在刺激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把实现长期的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目标。经过数年的努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把滞胀时期出现的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压下去，实现了长达7年之久的经济持续增长。虽然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股市暴跌引起紧缩，但影响并不十分严重。1980年至1988年，美国通货膨胀率从13.5%下降到4.1%，英国从18%下降至4.9%，原西德从5.5降为1.2%，法国从13.6%降为1.6%，日本从8.0%降为0.8%。1982年至1988年，西方主要国家的工业生

产增长率分别为：日本32.7%，美国32.6%，英国21.4%，原西德16.8%，法国10.2%。

应该看到，这一次世界经济长时间持续增长的特点是，随着世界七个主要工业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从而引起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需和外需模式的变化。与此同时，通过七个主要工业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引导世界经济持续而又不平衡地发展。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为主要依靠内需增长，其余则是外需带动。结果，美国经济由此遭受的打击是双重的：美国利用美元高汇价的好处，拼命购买外国货，使美国外贸逆差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需求转向外国货，使里根的减税政策起到有利于消费不利于投资的消极作用。财政收入非但没有增加，由于军事预算增加，使财政赤字日益扩大，造成以后几年经济增长与双赤字（即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并存的局面。美国被迫于1985年2月调整经济政策，希望通过美元汇率下调，达到减少进口，以制止外贸逆差进一步恶化。于是美国与其他国家协商，共同调低利率，使美国利率仍然与其他国家的利率保持一定的利率差。正是这些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内需与外需交叉的变化，又经过国际协调的密切配合，不仅使西方经济维持了持续增长的最长周期，而且也使美国与其他工业国家之间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状态在1987—1988年期间开始了缩小趋势。

可以这样说，在整个8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形成了“低速”、平衡而又持续的经济增长的明显特征。所谓“低速”，是指在80年代里，没有哪个国家的年增长率达到个别国家在70年代的个别年份曾达到的6—7%的高度。所谓“平稳”，是指既避免了通货膨胀加剧，又未导致失业扩大。所谓“持续”，是指一直保持着增长势头，持续

不断，未曾被经济危机或衰退所打断，甚至在1987年10月世界股票市场的暴跌也曾破坏这个增长进程。值得怀疑的是，为什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在80年代能具有这一“积极”的特点呢？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却颇为引人瞩目，那就是，在8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客观经济管理的实践中，各国政府对经济增长速度问题采取了一种新的姿态，即他们不再盲目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甚至不惜以通货膨胀为代价；而是以经济稳定，特别是以物价稳定为重心，让经济增长速度服从于经济、物价的稳定的需要，服从于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

其次，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地区化和集团化的趋势明显加强，表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西欧和北美（本书在后面还将详细论述）。

第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系列突出的不平衡发展和畸形发展。其中主要有①美国在80年代里所经受的财政、外贸的“双赤字”；②国际汇率的大变动，特别是美元对日元、马克的汇率在80年代经历了一个大涨大跌的过程。主要国际货币汇率十年间大起大落和近年来的频频波动，正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的重要表现之一。

第四，国际资本流向的逆转。国际资本不是从资本过剩的发达国家流往资金匮乏的发展中国家，而是流往资金需求极大的发达国家，尤其是流往经济头号大国——美国；更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发展中国家那少得可怜的资金也在流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第五，世界规模的重大经济调整。在80年代后期，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开始经济的治理整顿，纠正以前

的经济发展过热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问题，东欧国家也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发展中国家在稳定经济，改善产业结构和进出口结构；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在调整产业结构，如美国改革传统产业，日本转向“内需”型经济，西欧国家为缓解失业问题在调整产业结构。更引人瞩目的是，那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调整了自己的经济政策和战略，用所谓的供给学派、货币主义的经济战略取代战后几十年来占支配地位的凯恩斯主义。这一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经济影响，而且对于80年代西方世界经济的新格局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策思想和实践中的“保守主义回潮”。究其原因在于西方国家从战后几十年来以“国家调节”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战略转向80年代以“自由经营”、非国家调节或私有化为指导的供给学派及货币主义战略。这种“保守主义回潮”，在美国表现为以供给学派为主体的“里根经济学”，在英国是具有货币主义特色的撒切尔主义，在瑞典表现为对“福利国家”制度的“反思”，在法国和原西德也都有类似的表现。令人回味的是，这个“回潮”的矛头，主要指向包括国有制在内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正是在“保守主义回潮”的冲击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政府大力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掀起了所谓的“私有化”浪潮。